

通俗記憶：理論、政治、方法

Popular memory: theory, politics, method

Popular Memory Group, (1982). Popular Memory: Theory, Politics, Method. In Johnson, R. (Ed.), *Making Histories: Studies in history-writing and politics*. (pp. 205-252), London: Hutchinson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,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.

1982年，英國伯明罕大學/當代文化研究中心出版，本文作者：Popular Memory Group

這篇文章是根據 Popular Memory Group 於 1979.10~1980.6 之間，在當代文化研究中心的集體研究成果，該小組成員包括 Michael Bommers 等 12 人，這篇文章由 Richard Johnson 和 Graham Dawson 執筆。這是篇“探索”中、未完成的報告，研究團隊試圖對通俗記憶作討論和初步澄清。討論的三個主要出發點：(1) 對於專業史學連結到流行的社會主義和女權主義政治，所產生的限制和矛盾感到興趣，以“口述歷史”作為討論的例子；(2) 被一些受到批評的研究所嘗試的方向所吸引，例如自傳史、社群史，以及那些以文化研究或專業史學為主的批判。(3) 試圖去處理歷史寫作的問題。

全文分六個大標題：

一 定義通俗記憶

- (1) 通俗記憶作為一種研究的對象
- (2) 通俗記憶作為一種政治的實踐

二 資源和困難

- (1) 資源
- (2) 困難和矛盾

三 經驗主義的問題

- (1) 口述歷史—錯誤的防衛？
- (2) 另一選擇的閱讀—結構和文化
- (3) 文化的閱讀

四 歷史過程和自傳體形式

- (1) 個人和社會的關係

五 現在和過去

- (1) 一些通俗記憶的形式

六 關於研究的社會關係

Must become historians of the present too.

Defining popular memory

- Popular memory as an object of study
- Popular memory as a political practice

Resource and difficulties

- Resources
- Difficulties and contradictions

The problem of empiricism

- Oral history-the wrong defence?
- Alternative readings: for structure and culture
- Cultural readings

Historical process and autobiographical form

- The individual and social relations

Presents and pasts

- Some forms of popular memory

On the social relations of research

「通俗／流行記憶」是什麼意思？研究團隊給了臨時的答案，所以在文章第一部分首先定義通俗記憶，第一，作為研究對象，第二，作為政治實踐的一個面向。然後在第二部分，探討這個研究計畫有哪些資源，同時也指出它的限制和困難。然後在後續部分依次進行四項困難的討論。這整篇文章討論範圍，從理論和方法的問題，到研究和寫作的社會組織，都有涉及。

Must become historians of the present too.

也必須成為當代的歷史學家。

1 定義通俗記憶

1-1 通俗記憶作為一種研究的對象

定義通俗記憶的第一步是延伸我們所說的歷史寫作（historywriting）。1960-70年代，為服務一群專業讀者群，成立兩種被視為對立立場的歷史期刊（1976年同年發刊）：*Social History* 和 *History Workshop Journal*，一個是追求謹慎的歷史前衛主義，另一個是公開宣稱社會主義的想法，承諾投入真正「通俗」的歷史。

Ken Worpole¹曾對英國社會近二十年來（1960-80年）顯著增長的勞工研究提出質疑。他的觀察，直接關注歷史著作的形式及其生產、分配、閱讀的社會條件，提醒我們需要更多地超越學術歷史寫作的限制，擴展歷史作品的產出，運用各種的方法，使「過去感」（a sense of the past）在我們的社會中建構起來，而不一定要採取書面或文學形式。我們稱這是「社會記憶的生產」（the social production of memory），雖然不是每個人都能平等地參與，但意義上，每個人都是歷史學家。我們自己是由過去所形塑，但也不斷地重新塑造那個形塑我們的過去。在追求「通俗記憶」的第一個問題是：社會記憶藉由什麼方法（means）而產生？與什麼做法（practices）有關，特別是和那些專業歷史寫作的關連？

「過去感」的產生有兩種方式：第一種是通過公共的陳述（public representations），第二種是通過私人的記憶（private memory）（但其中也可能是集體和共享）：

第一種方式，包括大眾的歷史「戲劇」，一個公共舞台和一群觀眾製造出「我們的」歷史；英國人民的文物、故事、傳統和遺產。這個公共舞台被一群人的腳本佔據，我們稱這些建構公共歷史氛圍和控制發行手段的機構為「歷史機器」（the historical apparatus）；稱這些機構的產品為「公共歷史陳述的領域」（the field of

¹Ken Worpole 是倫敦首都大學（Metropolitan University）城市學院的名譽教授，出版許多有關建築、景觀、城市規劃和社會政策等方面的著作。

public representations of history)。這些陳述，影響個人或團體對過去的概念，稱之「優勢記憶」(dominant memory)。並非所有的歷史陳述在獲取進入公共領域後都能具優勢主導，相對地，具優勢主導的記憶都是在競逐過去的鬥爭中產生，而且總是打開論爭。

歷史的建制 (historical constructions) 像是政府和議會制度，本身就是歷史機器。還有君主制度和軍隊，提供非常傳統的東西：年節、皇室婚禮、國事訪問、國家葬禮和紀念活動等。這些建制，起源自官方，但透過媒體的大鳴大放，它們都在社會大眾的休閒和娛樂中，以一種實際生活的樣態被再現。

其他的機構或制度 (institutions)，享有較程度的自主權。在這裡包括博物館、藝術畫廊、外商投資紀錄、國家信託、國家大劇院，和「文化政策」等。或許，教育系統本身也屬於這裡：學術生產者、正式課程、教學大綱、考試，和廣泛用於學校的文本。

歷史 (history) 也是樁生意。整個出版活動的範圍都很重要，特別是因為歷史寫作，比起其他社會科學，有更多是業餘的或外行的市民。標榜「歷史的」書通常可登上暢銷書之列，尤其是傳記和自傳、歷史小說、軍事歷史；在英國，第二次世界大戰提供了取之不盡的歷史事實與虛構。其他如：流行小說、歷史電影、科幻小說等。還有目前大規模成長的「歷史景點旅遊」，這些具有歷史意義的地方，也成爲一種資源，在身體上或思想上提供休閒和旅遊的產業。而旅遊書，商業化生產和大量流通，爲這些觀光景點裝封其歷史意義。

大眾媒體 (the public media) — 特別是廣播、電視和報刊 — 也是歷史建制的主要來源。媒體生產自己特定的歷史敘述；生產每日的當代歷史。但是，媒體也選擇、放大、改造對過去的建構；也越來越多地借鑒口述歷史 (oral history) 和昨天的見證 (yesterday's witness)，給伴隨政黨鬥爭的過去概念一個特權的空間。所有歷史機器以電子媒體最引人注目且無處不在，透過這裡，往往決定了一件歷史敘述的流通。

大多數縣和城鎮 (counties and towns) 都有自己悠久的歷史和考古的系譜。還有像是連接教師和學者的歷史協會，這些組織以業餘者的歷史熱情，維繫強烈的地方感。「口述歷史」和文史工作室的增長，都帶來新的參與形式。

各種網站 (sites) 和機構採取不一致的行動。有時，這種不和諧被直接介入控制 (例如審查)，和被暴力地重啓或關閉整個公眾歷史的領域。

第二種方式，私人的記憶可能被記錄在：信件、日記、照片相簿、收藏品，和奇

聞軼事中；而如果這是歷史，那就是在極端壓力和匱乏（pressures and privations）下的歷史；通常這樣的歷史是在私人記憶層級；它不僅是未記錄的，實際上還是沉默的，沒有被提供說話的時機。在某個層面，現代婦女運動讓婦女在歷史上隱藏的感情、思想和行動，更清楚地被看到。女權主義歷史（feminist history）挑戰女人從過去以來被沉默和邊緣化的問題。同樣的，還有未受公平對待的工人階級歷史。

這種口述歷史、自傳、以社區為主之出版的復甦，已經成為激進的、民主化趨勢的任務。我們要強調的是，通俗記憶研究不能僅侷限在這個水平；而是必須涉入公共領域中優勢的歷史陳述，同時試著去放大或普及那些屬於次級的或私人的經驗。在具體的研究裡，私人記憶不能從優勢歷史論述的影響中，輕易被拼湊而解讀出來。許多過去的記憶，是奇怪的複合結構，類似一種地質學，是過去痕跡的選擇性沉積。通俗記憶的研究關注兩組關係：一組是「優勢記憶」與整個公共領域（包括學術）的「對立形式」之間的關係；另一組是當代戲劇狀態的「公共論述」與來自生命文化而對過去「私有化感受」之間的關係。

1-2 通俗記憶作為一種政治的實踐

社會主義者、女權主義者和激進的歷史學家一直都理解：歷史問題與政治相關。左派史學家常分享一種普遍但模糊的感覺：從馬克思主義或社會主義處境看，「歷史」必須是服務現在和未來的政治。但，歷史的這種政治用途，在我們看來是有問題的，特別是當歷史被定義為「過去的研究」，而從「通俗記憶」的觀點看，更是有深沉的問題。記憶，是一個術語，記憶吸引我們的注意，不是因為「過去」（the past），而是因為「過去存在現今的關係」（the past-present relation）；「過去」在現今積極的存在，而現今充斥著政治。

我們可以參照本書第二章作者Bill Schwarz施瓦茨的討論，用三種方法來區分歷史的政治關連性：

第一種方法，保留歷史的對象是「過去」，力求將過去和現在以有益的「教訓」（lessons）形式做連結。這種作法的消極力量，例如：警告作用，反對回到過去的災禍。但也有積極作用，透過確定「傳統」，然後成為當代鬥爭的一種資源。要言之，過去與現在之間的連繫、歷史寫作與歷史未來建構之間的連繫，在本質上都是一種規勸的作用。

第二種方法，使用歷史的視角和方法，構思過去存在現今的關係，作為策略分析的一個元素。從瞭解當代政治問題開始，力求探討當代困境止息的條件，檢視當前壓迫的性質和起源，追溯其起源、也追蹤其發展。強調通俗記憶，會增加兩個概念：一是對傳統的建構；二是對當代政治力量關係的充分分析，以歷史的形式，

追溯到遙遠的歷史時期。

第三種方法，我們堅持的是，所有的政治活動在本質上是歷史爭論和定義的過程，所有的政治計畫涉及過去和未來的建構。政治的統治涉及歷史的定義；歷史，尤其是通俗記憶，是不斷霸權鬥爭中的一種賭注。就像過去與現在之間的關係，歷史與政治之間也是一種內在的關係：是關於歷史的政治，和政治的歷史維度、面向。

透過例子會更清楚上述論點的影響。例如，「英國人」(the British People)，往往是半自覺的、種族主義的建構。藉由不斷重複、偽裝或對帝國和殖民統治歷史的慶祝，使優勢民族主義的主題變得很適切和徹底自然化。當權者定義什麼才是「屬於」今天的英國。如此一來，被他們邊緣化和壓迫的英國黑人，他們的歷史恰恰成爲保守派歷史的反面。

由社會主義、女權主義和反種族主義所形成的通俗記憶在當今特別重要，兼具一般原因及特定原因：

一般原因，如葛蘭西認爲，歷史感 (a sense of history) 必須有一種很強的大眾社會主義文化的元素。歷史感作爲一種手段，使我們對於挪用自眼前社會和文化的環境，而形成之社會性常識信念的形塑過程，能有自我的意識。歷史感不是要我們去復原那些「庫存」，而是要瞭解信念的起源和發展，意識到它們是如何被採用、拒絕，或修改重塑。

特定原因，形塑一個通俗的社會主義記憶，對 1980 年代的英國而言是迫切需要的。部分原因是英國政治記憶的痕跡，出現一種戰後幻滅和衰落的歷史，特別是，到目前爲止對工黨的關注，有一種失落和疏離感。但更困難而深沉的問題是，新社會主義的通俗記憶將會是什麼形式？懷舊 (nostalgia) 只是再現保守主義。

2 資源和困難

2-1 資源

這樣一個研究項目的資源，很巨大、但很混亂，不僅只是「缺乏組織」，而是系統性的混亂；不同種類而多樣之社會起源的資源，有結合上巨大的困難。以「歷史」爲例，發展的努力是爲減輕或完全消除「歷史學家」和「發源地顧客」(the originating constituency) 之間的距離。這種發展趨勢下的產品有：向來受歡迎的自傳、口述歷史、社區和其他通俗寫作形式的歷史。但是，上述發展也帶來學術實踐的批評：強調語言和價格的無法獲得 (inaccessibility)，以及強調作品中作者和讀者的投入，而不是生產和分配的過程。因爲強調「語言」(language) 和「素

樸的言語」(plain speech)，口述歷史的、自傳體的積極分子／活動家，往往深刻地批判那些優勢理論的形式。在我們看來，正是這種區分，為混亂的一個主要來源；激進歷史傾向的「活動家」和「學術」兩端之間的緊張關係，激烈到一定程度，往往帶來相當的破壞。即便如此，還是有人開始開啓耐心的對話，這可追溯到 *History Workshop Journal*，在其第 13 屆會議手冊中，一些作者他們的經驗跨越了「業餘」和「專業」的經驗。*History Workshop* (是期刊，也是「運動」) 原本指不同目標而互不可親近的兩塊區域，現在已經和其他團體，在「社會主義」或「人民的歷史」的旗幟下合作努力了。在這個意義上說，*History Workshop* 是另一個選擇的「歷史機器」(an alternative 'historical apparatus')，而其內部和外部的發展，在我們看來，都已指向通俗記憶的研究。

我們對口述歷史最感興趣的地方是：它常常處在下列兩者之間的緊張關係——「歷史目的vs.政治目的」、「專業的程序vs.業餘的熱情」、「口述歷史作為娛樂vs.口述歷史作為政治」、「客觀性的原則vs.主觀性和文化形式的旨趣」。本文後面，將以口述及社會歷史學家 Paul Tompson² 湯普森的早期作品來呈現這些緊張關係。除此之外，Lusia Passerini 帕塞里尼的作品，受女權主義影響，她關於義大利法西斯主義的通俗記憶作品，認為口述歷史的文本具有「文化和政治」的意涵(非僅僅是「事實」而已)，標誌一種思維上的巨大進步。

在英國，通俗歷史的實務發展，往往建立在社會和勞工的歷史傳統上。但 Ronald Fraser 弗雷澤的《西班牙之血》(Blood of Spain) 是用無數微小的個人敘述——故事、想起的感覺和思想、個人描述，編織成一個充滿英雄成分和無限複雜的大故事，這本歷史書透過複合的自傳、經驗的再創造，形成上千個敵對相爭的觀點。

另一方面，社群史、自傳、勞工史等有關「創作著作權」(authorship) 這個術語也已經徹底改變。事實上，真正危險的「歷史」是將歷史的圓周窄化，使關注的層面太狹隘。「通俗記憶」的討論走出了一個完全不同於國家的、理論的傳統，尤其在法國的辯論，圍繞在傅柯把「通俗記憶」印刻成一個專有名詞。法國辯論的重要在於，他們把注意力轉向不同於歷史書寫的一種「歷史的」類型，引導了激進文化實踐的可能性。這種類型的發展在：電影、電視劇、社區劇院和激進的博物館作品。其中有許多「締造歷史」(history-making) 的節目和作品，常有真正普遍的收視，但通常被歷史學家忽視。在這領域，創新 (innovations) 是通俗記憶作為研究對象和作為政治實踐的根本之道。

² Paul Tompson (1935 年生-) 同時是社會學家和歷史學家，他是英國介紹和編纂口述歷史方法的先驅，策劃了第一次由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資助的大規模口述歷史研究計畫，也是第一位長期為歷史學家介紹使用口述資源的人。他是 *Oral History* 的編輯，這個期刊主要作為口述史家之間的溝通媒介，並與 *History Workshops* 有密切聯繫。

2-2 困難和矛盾

口述歷史和自傳，雖然發展有一段時間，但為什麼政治影響力已經相當微薄？也許是因為新的實踐（指口述歷史和自傳）在學術或專業上的起源問題，和其對一般政治的適應問題，兩者之間存在緊張關係。在此，我們簡要總結四項主要的困難：

第一項困難：認識論上的性質問題。源自「歷史的」研究對象被定義的方式；圍繞在正統歷史實踐的經驗主義。歷史學家的經驗主義是一個真正的困難，它會阻礙政治上的進步，堅持經驗主義的立場顯示出對政治的影響。

第二項困難：口述歷史或自傳的第一次出現，是以何種「原料」(raw material)為形式：個人的證詞、敘述或自傳。這個問題涉及到個人主體，和其背後廣闊的社會背景。個人的見證較之廣大的社會變化有何意義？如何理解這些變化、個人的個性等。這些困難貫穿口述歷史的方法、自傳體的形式，還有類型的區分：是歷史、自傳、還是小說？

第三項困難：歷史的對象是「過去」，這種無庸置疑的歷史常識，運用到口述歷史和自傳時，產生十分矛盾的結果。因為這樣的定義若沒有一個徹底的去政治化 (a radical depoliticization)，在研究實務中是不可能執行的。口述歷史或自傳的形式，不只是關於過去「事實」的金塊 (nuggets of fact)，而是被建構和重構成為當代意識之一部分的整套方式 (the whole way)。

第四項困難：最根本的難題，是關於這些禁忌所表達的社會關係；口述歷史在認識論的問題－歷史學家將如何使用他們的「資源」－也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問題。實際上將涉及社會分化中的權力和不平等關係，這種權力是透過文化力量的剝削，而不是經濟力量或政治脅迫。一方面是「歷史學家」，專門從事生產的解釋和說明，建構自己成為最活躍、思維過程的人。另一方面是歷史學家的「資源」，一個活生生的人，在這個過程中被定位是產生信息者。但是，是誰決定最後的陳述、主導解釋、判斷可靠或不真實？是誰的名字被掛名出版？是誰獲得榮耀、文化資本？誰是創造者？誰能因此而成功地超越他的同儕？上述這一切，「資源」本身在整個過程中，除非放棄訴說，否則他們除了保持參與之外，不能改變什麼。

3 經驗主義的問題

專業歷史學家描述研究過程，總是採用經驗主義的陳述。但是，這種特殊的經驗主義形式，受到基本的檔案研究經驗的影響。歷史研究被看作是史家和「他的證據」之間的對話；歷史學家需要積極的參與，但也呈現出探究或假設的主觀性。

在英國專業歷史的實踐中，口述歷史的發展已經符合一般的歷史常識（例如：分期、資源/史料的來源），但口述歷史研究造成的緊張關係，出現在 Paul Tompson 早期作品《過去的聲音：口述歷史》（*The Voice of the Past*, 1978 年）中權威性地介紹口述歷史的方法，以及 Essex Project 訪談計畫的研究成果《愛德華時代》（*The Edwardians*, 1975 年），關於一個國家在 1918 年之前的家庭、工作和社會生活的訪談研究。在下文中，我們將使用《過去的聲音》（導論部分）來提出一個歷史學家的經驗主義方法，可能會限制口述歷史在實踐中的潛力。

3-1 口述歷史—錯誤的防衛？

《過去的聲音》一書中給予「從業者」（the practitioner）一個奇怪的綜合特徵：一方面，專業歷史學家使用口述資源是「完美地與學術標準相容」；另一方面，專業史家又是普遍信奉社會主義的觀眾。我們認為，這在本質上是矛盾的，是一種保守的解決之道。《過去的聲音》一書傳遞的仍是專業的歷史，而不是一個為求普遍社會主義實踐的歷史。因為該書採用經驗主義的解決方案（empiricist solutions），依賴狹義的實證社會科學，尤其是量化社會學和實驗心理學；這種經驗主義的舉動，卻使口述歷史較少依賴理論和政治的觀點、較多依賴方法本身。

藉由方法的主要力量，口述歷史提供去專業化（deprofessionalize）的歷史：它讓歷史回到用自己的話說話的人們身上，據此，口述歷史將改變研究的社會關係，因為它本質上是民主的；這將改變歷史的內容，因為它必然提供另一種觀點，一種「來自下面」（from below）的觀點。這些陳述方式是經驗主義的，但停留在討論口述歷史的內容和實踐，而忽視權力的關係在不知不覺中進入了這個方法，因為從開始採訪的設計，到最終陳述的呈現，每一個節點都沒有立論（theorized），換言之，有比方法更重要的事，就是使口述歷史進入社會主義的實踐。但在 Tompson 的文本中，卻用歷史學「專業標準」的論述大大加強一種保守主義。

一般對口述歷史的批評，一是，記憶的易錯、不可靠性（fallibility），因為記憶是一種高度選擇性的過程；登記這些、丟棄那些的過程。二是，某些記憶可能被隨後的經驗所影響；在經驗主義的框架內，資源用於重建一個給定事實的過去，但，記憶卻在後續經驗和變換解釋框架的力量下不斷的轉型。Stephen Koss 科斯認為，這些困難是不可逾越的；口頭證人提供最個殊、生動、尖銳的見解，通常是無法驗證的，只能稱之事實的現實（factual reality）—曾經發生了什麼，而不是什麼樣的人可能會相信發生的事。這個問題就變成了如何運用一些方法去處理資源，並使之成為可靠。

Tompson 採取兩條路線，防衛口述歷史對抗專業歷史學家：一則，他表示所有史料都具體共享人類的起源和社會的目的，所以會有偏見的問題。二則，他開發一

套蓄滿電力的方法，旨在維護口述歷史實踐的準確性。

我們希望在此強調，Tompson對口述歷史之經驗主義的防衛，代價有二：

第一，這些回應無情地複製了口述歷史應該去改造的社會分化（social divisions）。因為科學化的要求，被強加在採訪本身一種「與人接觸」的形式上；歷史學家必須帶著一組標準化的問題接近受訪者；整個研究計畫（例如《愛德華時代》）需要對研究者在勞動力之間的層次劃分；在方法上關注「採訪技巧」，以取得所需信息。這是一些在「父權」紀律下令人熟悉的技術。然而，在社會學中，這種對實證主義方法論的信心已經長期以來被削弱了。

第二，這些回應使文化決定和影響變得相當輕微。因為經驗主義往往使歷史學家本身的「文化」無法呈現。中立、事實的驗證模型，這種信念低估了研究者自己的價值、理論和實際影響力。經驗主義所強調「方法」和「來源」的困難，一直以來都掩飾了陳述所需的理論前提。另一方面，經驗主義也掩飾「資源」本身文化性建構的特質。因為如果我們把歷史來源僅作為「事實」的載體，興趣的會是關於過去的行動和作為，而不太會關注歷史、社會的建構價值，而這些價值正是「信息」的媒介，亦即，歷史的實踐不能忽略其所處的文化框架。

我們不能忽視口述材料的特殊性，應該去開發概念性的方法，口述歷史的原始材料不只是事實的陳述，而是一種文化的卓越再現及表達，因此不僅包括文字敘述，但也包含記憶、意識型態和潛意識欲望等面向。總之，通俗記憶的研究，只有在突破經驗主義和實證主義的規範下才可以開始。

3-2 另一選擇的閱讀—結構和文化

對口述歷史和自傳的陳述方式的理解，有兩種不同、但相互依存的閱讀方式，我們稱之「結構的」和「文化的」閱讀方式：

結構的閱讀（a structural reading，類似歷史學家對來源之「事實的」閱讀），關心的一篇陳述的作者他如何主觀地挪用一些已成型的條件、結構、流程，這些特殊的活生生經驗。這樣的解讀是假定在該陳述之外，有一些真實的指涉存在，並不完全由寫作本身構成。然而，一端是事件和過程vs.另一端是陳述，彼此之間的關係，在脫離經驗主義到某種程度，會徹底呈現出問題和造成自身的變革。這讓我們看到，為有效的探索，口述歷史工作者面對專業的批評，都大大低估了自己「資源」的複雜性。事實上，口述或自傳的陳述，都是豐富和較不嚴格的「可靠」。

一件陳述「經由閱讀」到其「事實」的底層／基質，是極為複雜的一個過程。這過程至少取決於兩個條件：一是，具有陳述本身以外的相關知識來源；二是，具有豐富的社會關係和社會意識形式的理論。Jerry White主張：我們需要一個更批

判、更解釋、更社會主義的地方歷史（socialist local history），認為自傳是作為理解社會主義發展的一種原始材料，而這可能涉及到，人們在理解自己的壓迫後所要面對的方式。White提出深沉的困難是：次級資料的分析（secondary analysis）、想更深一層、進一步的研究、力求更深層次和更多解釋的陳述，而這些陳述總是伴有中產階級評論者的干預，不是專業歷史學家就是社會學家。如此一來，一方面需要有政治或專門術語的充足知識，另一方面，現有社會智力分化³的需求。這種倡導更多的分析方法，是站在知識分子的理論傲慢。而對「活動家」而言，對付這種優勢文化的威脅，他們採取代表他們立場所看到真正本土的、道地通俗的理解。於是這個圈子不斷再製權力和知識的現有關係；分離理論與實務脈絡的現實；迴避兩者的相遇—以理論為主的中產階級左派政治，和以日常問題為主的工人階級之結構和文化。我們認為實際上也沒有必要連接兩者，目標應該是去普及（generalize）次級資料分析、輔助研究所需的技能（skills）。

3-3 文化的閱讀

文化的閱讀（a cultural reading），其方式聚焦在該陳述使一個結構化的經驗或生活史變得有意義。這個觀點依賴兩個前提：第一個前提，所有的陳述，不論是在回答研究者的問題或自發性產生，都是高度構建的文本或表現。閱讀這種充滿思想、巧藝、語言、文學技巧的陳述產品，總是有作者的活躍身影投射其中，用非常普遍的言語，呈現熱鬧的對話和故事。第二個前提，陳述的文化特色，不單是個別作者的產品，同時也運用一般文化劇目、語言特徵、表達規範，以有助於決定該說什麼、如何說、和有什麼樣的影響。要之，發展文化閱讀，我們必須理解一些文化陳述的形式，還有它們的起源和影響，如此我們才不會對那些陳述內容，存有一定的偏見或意識型態。

結構閱讀和文化閱讀的合流模式（pattern of convergence），是最應該達到的閱讀理解。例如，一個女人生活史的自傳陳述，從孩提、婚姻、教養、社會工作等，人生有重大轉變的「連結」，它強調作者（一個女人）的歷史和社會地位，一種結構的接合，表示在歷史現實中，曾有一個生命存活過。但是，它也以文化來組織陳述，出現一種特殊的力量和強調，使許多重要的故事被講述出來。

4 歷史過程和自傳體形式

³我們對社會的存在、歷史、認識世界的方式，所建立第一個想法的過程，是「製造社會主義者」所需核心動能的一部分，這過程須同時擁有「常識」和「理論」。因為每個人都具有一種社會意識，就這意義上說，每個人都是「一位哲學家」，不需要把這種特權讓給「知識分子」。問題是，在我們社會中知識的技能和功能受到社會分化：是文化剝奪和壟斷的過程。其結果是搶走了達成現實所需的理論，特別是與大多數人有關的社會條件，但也壓抑了來自常識的技能和觀點，這些技能和觀點可能會使理論變得更加廣泛和批判性。

口述歷史和流行自傳都是系統地個性化（systematically individualize）的形式。怎樣才能使自傳體材料，成爲一個關於過去和現在，更爲結構性陳述的來源？

Tompson建議三種不同方式來呈現口述歷史的陳述：(1)單一生活故事敘述，特別是有豐富記憶的重要訊息提供者；(2)生活史的收集，圍繞共同的主題，或呈現最典型的生活史材料；(3)交叉分析（cross-analysis），把口述材料當作一個採石場，從而建構一個討論。(1)和(2)可以組合在一起，保存最完好的原始材料。(3)這種模式，由歷史學家用自己的論點進行邏輯的分析，交互混用引文。

在《愛德華時代》這本書的口述歷史材料中，使用的交叉分析形式是什麼？它用生活史（life histories），呈現出凌亂的現實（the untidy reality）。這種生活史，通常無法完整的分析社會變革或社會結構。雖然在有限的條件下產生，但生活史的陳述仍被視爲一種相當珍貴的資源，展示出資源的「原始」（raw），讓資源「爲自己說話」（speak for themselves）。

但是口述歷史和自傳的豐富性（richness，如：處理文化的形式、記憶的積極建構過程、與主體間的交互作用而產生第一手「證據」、歷史上因特殊「證人」而產生的主觀性）仍然是難以捉摸的，因爲它不能成爲 Tompson 在自己的認識論和理論框架內，一種特定的知識對象。也就是說，在希望直接展現通俗記憶（用一種不被承認的解釋框架）和希望史家不放棄宏觀解釋責任之間，存有一種罪惡的拉扯。在此我們特別關心的是，在「社會變革」和「社會結構」vs.個人故事和採訪之間，未能取得一個真正有機連結和內部關係。到底在 Tompson 的方法，或更正確地說是他的理論之中，缺少了什麼？我們認爲是，在大規模社會進程中歷史陳述的一般對象（the usual objects），和在小規模「私人」敘述一些非常個人回憶的東西（the stuff of personal memories），兩者之間缺乏橋接的方式。

4-1 個人和社會的關係

自傳或生活史，不應該只是「豐富」，還要有重要性、強而明確的代表性。除了以一種非經驗主義的方式來閱讀它之外，還包括使其形式具有活生生的文化和主觀性的元素。不過我們仍要堅持「結構性」的閱讀，這類陳述代表著一個更大的陳述，不是因爲它們表達了一個總體抽象的人性，或一個特別獨一無二的主體，而是因爲它們是社會個體的產物（product of social individuals）。它們的作者在特定的歷史時期、特定的社會特徵、複雜的社會關係下，說出了自己特定的位置。口述歷史學家，就像當代人類學家一樣，需要這些社會關係的理論—意義上的結構—看到個人生活史作爲一般歷史的一部分，例如，某種階級的形成或重構的歷史、重男輕女的男女關係被打破或加強的歷史。

Part 5 現在和過去

正確的歷史研究對象，不是過去、而是過去存在現今的關係（the past-present relationship）。歷史寫作必然是一個理論上和政治上的活動，所以也是一個「在現在和為現在」（in and for the present）的實踐。理論、政治和當代性是這個實踐的基本條件。而口述歷史的方法，運用過去存在現今的關係，出現的一個主要問題是：記憶的不可靠性。記憶的模式，是隱含的、被動的；記憶是往事的沉澱形式，是遺留下來但可能被質疑的痕跡。於是 Tompson 在《過去的聲音》一書中採取一種保守的作法，引用心理學家的調查結果，作為經過長期時間後，記憶之相對地可靠性和穩定性的證據。

口述歷史的證詞，不是將過去的事件形塑成一個簡單的紀錄，它們是複雜的文化產品；涉及在私人記憶和公眾再現之間，在過去經驗和現在處境之間的交互關係。再者，口述歷史的證詞，是受目前的論述和經驗深刻的影響，就這個觀點，口述陳述（和正式歷史）都是被建構的，因此，記憶是本身就是一種深刻複雜的建構和一個非常活躍的過程；過去事件透過複雜的記憶過程，被運作和重新運作。圖 3「通俗記憶即社會關係」，並不打算對記憶是紀錄的概念，發展替代性的選擇，而是要指出這種複雜性。

過去不是以一種給定的「東西」（thing）被理解，我們所理解的過去，是透過在目前不斷引起共鳴的力量下所產生新層次的聲音和意義。這樣的論點有兩個實踐的意涵：

廣泛的意涵，關於過去和現在的討論，指向歷史和政治的統一、指向歷史工作即政治的一個面向。如果認為這是自相矛盾、甚至危險的說法，那往往是因為我們設想的「政治」過於狹窄，只處理「偉大的公共議題」，然而，在一個更大的政治工程—辯論和鬥爭整個社會的未來，「記憶」是一個至為重要的資源，幫助我們了解當前條件下的性質、歷史性和可變性（nature, historicity and changeability）。

具體的意涵，社會主義者和女權主義者，需要發展一個為以後生活的政治。而老人對社會主義和女權主義在通俗記憶的貢獻，牽涉到這樣的政治戰略。除了年齡，階級、性別、種族，都是可用來進行比較的。我們應該從當今老年人的經驗分析開始—那些具體之壓迫和文化邊緣化的形式，並從假設開始，老年人他們的回憶，有時透過積極的反思，可能會對我們當今的政治產生貢獻。

5-1 一些通俗記憶的形式

我們已經注意到口述歷史的陳述，有一些反覆發生的特點：這些不同技巧的形

式，從文學到口頭表達都有；講故事的形式（story-telling）無處不在；以過去存在現今的關係（the past-present relation）作為基本的回顧條件；強調「個人」特質（personal character）的陳述。這裡「個人」特質指兩個相當不同的東西：第一個特徵，也是最普遍的，指的是陳述文本中的「人文主義」（humanism）。如果說，有一種拜物主義，那口述歷史的陳述就是拜「人」、而不是拜「物」。社會關係的理解是通過居住在這土地上的人們的素質；結構的決定顯示出人與人之間的關係；以人為本貫穿最常見的講故事形式。第二個特徵，充滿個人特質的文本，在處理過去存在現今的關係，其方式是通過與人際之間的親密關係，特別是通過世代的比較。

6 關於研究的社會關係

我們強調，在知識生產的社會關係中，不同性質的作者位置。我們特別關心「歷史學家」的角色，是作為一個專業的壟斷者，或是將成為歷史知識生產的壟斷者。這些壟斷的形式（和他們往往複製的專業上意識型態）要如何打破？

在美國，一種大型且有龐大資金資助，關於口述歷史的「計畫」，通常會有官方作後盾。這類計畫強調社會分化（social divisions），其計畫本身就鑲嵌在內，不僅研究主體與研究客體，還有研究者之間，都是分工各職所司，甚至可能委託設計一個研究計畫，雇用一個商業公司去進行田野調查。這類研究計畫的形式是有問題的，在實際工作中，往往會加強現有知識和權力之間的關係，行使一種象徵性的暴力，藉此取走人們的記憶，用於學術，而對原始資源提供者卻沒有相對應的回饋。

然而，在英國，這樣的大型計畫不常見。較常見的口述歷史和類似研究，出現的是研究者本身社會地位的矛盾，例如，在專為工人階級開辦的成人教育中，口述歷史和「人民的歷史」（people's history）的研究，其的知識矛盾往往在「回到社區團體」和「前進大學」之間拉扯。事實上，透過社會歷史的研究，比較能符合廣泛的社會模式，帶動階級的流動。階級流動經驗的重要（特別是通過正規教育）在於沈澱出政治的問題，和促成那些圍繞著階級文化之差異和關係的知識性工作。然而，儘管研究的主體和客體如此親密，但分工仍然存在，我們進一步要探討的是，這種知識是為誰？要去引導誰的實踐？

有一些激進的知識社群，都力求發展以社區為基礎的寫作和出版，人們來這裡的目的，一直在挑戰乃至重構：知識生產、知識流通、讀者群的社會關係。工人階層的作者，不論個人或集體，都被鼓勵開發通俗的方式寫歷史、自傳、或小說，閱讀對象是工人階層的讀者，進行在地的知識流通。這種以社區為基礎的運動，

精確地指出：知識生產的社會分化，即是一個鬥爭的重要領域；沒有一個通俗記憶的政治不被納入。

通俗知識生產的困難，第一個主要的困難，在於勞力的分化（divisions of labour）和權力的關係（relations of power），在一個地方被挑戰和修正，又即時重現在另一個地方。著作權的民主化，使得口述歷史的「證人」，現在同時是受歡迎的自傳寫作者。歷史學家和其「資源」形成的社會分化，雖然這個知識生產關係中被取消，但可能會重新出現在另一個關係中，因為新組織關係內技能和文化力量的差異。這種現象帶來的危險，使得文化權力的行使，變得相當無意識，影響所及，只是重複循環知識社群中的已知現象。

我們要重申，上述矛盾較少因為「社會認同」因素，較多因為「立場」和「連結」的因素。換句話說，有機知識分子的工作，不是關於你是誰的問題；而是關於你著手研究和解決的是誰的問題。以次級階級和團體的日常生活作為議題的來源，從這個立場生產知識，並在大眾經驗和已發展的智力功能之間作連結。最終問題成為，如何組織這種政治上的連結、如何普及化次級資料分析的技巧、以及如何連接這個通俗教育到日常生活中。

第二個主要的困難，涉及通俗的歷史寫作和公共領域歷史陳述之間的關係。真切而通俗的表達雖然高於一切，但優勢記憶縱使不一定被看到，卻仍普遍存在。執政者的想法傾向是，「資產階級」不一定是起源，但卻符合執政者優勢主導地位的社會關係。我們都生活在一個資本主義、宗法、種族主義的社會秩序，受限於真實性的追求，和真正通俗的表達。在這個階級的奮鬥—尋求另一種選擇的生產和工作—需考慮優勢者的論述和生產方法。

※問題與討論

這篇文章所指「結構的閱讀」具體意涵為何？教科書作為制度文本，承載官方知識、官方記憶，對教科書文本的閱讀，也可以在此與「結構的閱讀」和「文化的閱讀」作連結和思考嗎？這兩種閱讀方式，對今年底「重構歷史教材工作坊」試圖尋找另一種觀點的教材設計，可以有什麼樣的啟發？